

作為學科建設“供給側”的學術期刊*

楊九詮

[提 要] 學術期刊是現代學術體系的制度性設計。學術期刊作為“供給側”，參與對科學知識的合法性承諾和資源性分配，確認和維護著科學研究的學術質量和榮譽體系。對學科建設的“供給側”功能，是學術期刊的 DNA；予以強調，乃是追本求源的解蔽與回歸。“科學知識語用學遊戲”，是“供給側”展開和運行的機制。“超建制”，是學術期刊“供給側”的組織形態。圍坐在學術期刊這張“桌子”旁，具有共同目的和興趣的專業同事自發形成了眾多學術共同體。論文因正式刊發得以成為學術交流網絡的節點，節點連結勾勒出不斷變易的學術空間，不斷推動著知識生產、學科發展和學術繁榮。

[關鍵詞] 供給側 學術期刊 同行評議 科學知識語用學 超建制

[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2 - 0126 - 12

“科學社會學之父”羅伯特·金·默頓(Robert King Merton)，在代表作《科學社會學》中考察了學術期刊制度，將學術期刊作為科學制度的組成部分而納入到他所建構的科學規範結構理論中。本文擬設的“作為學科建設‘供給側’的學術期刊”的議題，乃是在現代科學知識制度意義上對學術期刊參與建構學科的功能、機制和體制的拓展討論；而所謂“供給側”，意指學術期刊參與對科學知識的合法性承諾和資源性分配。需要預先申明的是，“供給側”的命題，更多的屬於理想型概念，可以用於測量與分析作為個案的具體學術期刊或學術期刊發展的某個具體時空，從而考察具體對象與特定情境的複雜性和獨特性，並非完全是透過現實與現象所揭示和總結出的本質與規律。正如默頓所究明的：“在任何制度領域中，社會規範都沒有與社會實踐完全相符。偶爾違反規範的情況並非必然會導致這種理論結論，即規範僅僅是認識論的或僅僅是意識形態的東西。”^①

引論：“供給側”與“需求側”

供給側(Supply Side)與需求側(Demand Side)，是生產與市場相互關聯的兩翼。我們這裡主要討論“供給側”，不僅僅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先就“供給側”來論，更是因為學術期刊之於學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課題“中國教育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政策研究”(項目號：BGA220155)的階段性成果。

科建設,“供給側”乃是主導性的。對學術期刊來說,其市場是典型的“非彈性市場”(inelastic market)。學術期刊的產品和服務需求,幾乎無價格彈性。如果期刊定價和期刊出版週期(季刊、雙月刊、月刊等)發生調整,需求量幾乎不會隨之發生相對應的起伏變化。原因在於:其一,學術期刊及其刊發的論文是非替代性產品與服務,即不訂這一種期刊可以換另一種來訂、不讀這一篇論文可以換另一篇來讀的可能性空間比較窄;其二,與圖書音像出版機構以利潤為中心的發行工作不同,學術期刊的傳播面對的專業同行,用庫恩(Thomas S. Kuhn)話說,論文“只寫給專業同事們讀”^②。舉一個中國期刊人和學人都熟知的知網(CNKI)的一則例子,也許更能看得明白。《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行政處罰決定書》(國市監處罰〔2022〕87號)對知網作了行政處罰。問題因此解決了嗎?至少從事實上看,沒有。該處罰決定書正是在對“替代性”與“非替代性”逐一甄別中申明處罰的依據的,但之間也確實程度不一地存在灰度空間。《新京報》報導這一事件時問出:“知網如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③其原因固然頗為複雜,而“非替代性”與“非彈性”乃是其難以治理的關鍵所在。

學術期刊的供給側與需求側兩翼,在科學規範結構的框架內分別表達了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的兩類不同層次的一致性。“需求側”表達為表面效度,而“供給側”則表達為內容效度。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指的是非專業人士依憑經驗直觀,通過彼此的直接關係來判斷兩者之間一致性的有效性。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則是由專家依靠科學驗證,通過整體的邏輯關係來判斷兩者之間一致性的有效性。我們這裡使用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更多是“化用”,以表達兩類不同層次的一致性,從而強調“供給側”之於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兩者關係的科學知識生產的制度性特徵,亦即學術期刊對科學知識生產與傳播具有結構調整、要素聚合、資源配置的功能。茲列表如次(見表1),以作區分。

表1 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的兩類一致性

效度	專業度	風格偏向	角色取向	句式1	句式2	備註
表面效度 (需求側)	直觀—直接的 經驗性描述	勤勉態度 接受型的	案頭編輯	歡迎來稿 擇優錄取 優稿優酬	為他人作 嫁衣裳	* 句式1 對應 風格偏向
內容效度 (供給側)	科學—邏輯的 專業性描述	籌劃能力 建構型的	策劃編輯	優秀學術成果 生產與傳播 的策源地	嫁女兒 與挑媳婦	* 句式2 對應 角色取向

在表1的表頭部分,我們分列了“句式1”、“句式2”兩目。“句式1”對應“風格偏向”目。“句式2”對應“角色取向”目。我們這裡所說的“句式”,不是一般的“造句”的例舉,而是語法學意味上的,亦即是一種定義方式。為人耳熟能詳的“歡迎來稿,擇優錄取,優稿優酬”,是典型的“需求側”行事。“策源地”則是典型的“供給側”作為,而“中國教育研究優秀學術成果生產與傳播的策源地”乃是《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的“目標定位”,表達了期刊對教育學的學術進步與學科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定位與努力。“為他人作嫁衣裳”,是人們提到編輯出版者時常聽到的一句話。人民出版社原社長、總編輯薛德震亦曾以此作為自己文集的書名。這裡要說的是,至少就學術期刊而論,“為他人作嫁衣裳”不應該是對工作屬性的規定性的修辭表達,而毋寧是職業道德的

自律、自省與自勵。2018 年上海財經大學期刊社開展了一次頗為有趣的活動，編輯與作者交換角色，彼此進入，相互體認。活動的主題就是：“嫁女兒”與“挑媳婦”。此乃妙絕之詞也！“嫁女兒”與“挑媳婦”不正是對面看來的“共建”關係嗎？既然是“挑媳婦”，那就是自家事，又豈是單向的“為他人作嫁衣裳”呢？其用以作為學術期刊規定性的修辭表達，不亦宜乎？也是從這層意義上看，中國社會科學院直屬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 52 位主編和資深編輯撰寫的《“作嫁衣者”說——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編輯心聲》^④，將學術期刊的角色取向定位為“作嫁衣者”，其為謙辭則可，但作為描述性定義或可斟酌。要之，從表 1 可見出，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的兩類一致性，並非是等值的。“供給側”作為內容效度，是主導性的、定義性的；“需求側”作為表面效度，是輔助性的、操作性的。

“學術期刊不僅是知識傳播的媒介，它本質上即是一套引導科學家投稿與發表優質論文的制度性設計。”^⑤正式刊布是經過期刊審稿與同行評議雙重篩查而精選出來的，從而在制度規則框架內為學術論文的品質也為作者（學者）的學術地位和聲望的累積與確證履行了“註冊登記”工作——按照韋伯的理論，學術期刊作為科學體系中的不可或缺的“合法性形式”，看護、維繫和推助著現代知識的“合法化”進程。歐洲學術與專業出版物協會（ALPSP）主席 Bernald Donovan 有論：“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學術期刊當作科研論文的裝訂冊，因為它的內涵遠不止於此。它既能讓讀者跟蹤所在領域的研究進展了解專家的研究領域關注科研動態和研究的焦點，又能提供專業的知識積累。而且，它可成為某學術團體關注的焦點，以及用來判斷同行的效率和競爭實力的工具。從長遠來看，學術期刊不僅很好地跟蹤了其專業領域的發展，還不時地影響著它的發展。”^⑥“它的內涵遠不止於此”，所說的即是“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的主輔關係。也正是在“供給側”這個意義上，有學者說：“學術期刊一直在有力地塑造學術的實踐，確立了學科的研究方向、專業話語，學術革命通常是由期刊引發的。”^⑦誠非過譽之詞。

一、肌理：初始設置——“功能性”供給側

1. 傳統範式還是現代轉型？

作為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一致性的審察，我們將“供給側”視為內容效度，而將“需求側”視為表面效度。兩類之間的深淺、主輔關係，上文已有證焉。然而，編輯學界似乎更傾向於用“傳統”與“現代”的框架來理解分析，亦即視勤勉、接受型的案頭編輯為傳統工作範式，而視籌劃、建構型的策劃編輯為現代工作範式，其如論者所指陳的：“在傳統編輯理念裡，編輯為他人作嫁衣的職業特徵，一直是被放大和推崇的，放大到甘於成為他人成功的平台，自己卻永遠躲在他人輝煌的背後；推崇到一輩子捨己為人，只知耕耘，不問收穫。”^⑧“策劃時代的編輯工作與傳統的編輯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的區別。策劃時代的編輯主體的工作性質發生了質的改變，策劃編輯的工作有了新的含義。他的地位與作用在整個出版活動中居於主導，他被賦予更多的權力，相應地，對策劃編輯的工作能力和意識水準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策劃時代編輯主體的工作重心從傳統的後期加工轉向了全程策劃。”^⑨後來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亦有將“需求側”之表面效度歸之於紙媒時代，實際上仍未脫“傳統”與“現代”的區分。故而，討論兩方面關係，常有“轉型”一說。如有期刊人論：“隨著高等學校‘雙一流’建設持續推進，很多高校已經將學術期刊建設和發展納入學校整體發展規劃，被邊緣化的高校學術期刊編輯重新引起大家的關注，被賦予更多責任和使命。在新時代，高校學術期刊編輯除了具有審編校領域的傳統主體性價值，其主體性價值還延伸至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創辦高水準國際化期刊、舉辦學術會議等方面。”^⑩這是“傳統—現代”框架。同文又論：“在紙媒時代，學術

期刊編輯的主體性價值主要體現在收稿、審稿、編輯加工稿件、設計製作紙質期刊的流程中，文字編輯工作是其主體性價值的核心。”這是“紙媒—新媒體”框架，邏輯上可以歸之於前一個框架。

這裡的討論意欲指出的是，“供給側”之於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的關係，恰恰是“傳統”的，而非是後來者與新生代。筆者曾有《論學術期刊的學科建構功能》^①一文對此做了初步探討。要之：參與建構和定義學科是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這一功能具有發生學意義，學術期刊與學科體系的發展乃是互動互構、相輔相成的關係；論文乃是現代科學研究的基本範式，學術期刊作為論文的載體和篩子，是科學知識生產不可替代的參與者。該文還專節討論了學術期刊的部門屬性，指出學術期刊是學術部門而非出版部門，對學術期刊來說出版是操作性的學術才是規定性的。“出版的操作性”大抵可對應上節討論的作為表面效度的“需求側”，而將學術期刊歸之於學術部門，正因於學術期刊對學術與學科的“供給側”功能。

2. 《哲學會刊》的“四項基本功能”

學術期刊作為學科建設的“供給側”，就學術期刊的出身而言，可謂“自古以來”，乃學術期刊的DNA。創建於1665年的英國皇家學會《哲學會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本文有引文譯為“哲學學報”），是世界上第一本科學研究方面的專門性期刊，也是最早的同行評議期刊。《哲學會刊》從1665年一直出版至今。皇家學會的早期秘書之一亨利·奧登伯格（Henry Oldenburg，本文有引文譯為“奧爾登堡”）是《哲學會刊》的創辦人。17世紀的歐洲，聚會於咖啡館交流創意和發現，成為文人、學者、藝術家、科學家風靡一時的風尚。咖啡館超越了其自身，成為興起的“文人共和國”星羅棋布的表徵。皇家學會和《哲學會刊》的主力牛頓、胡克、波義耳等一眾科學家都是咖啡館的常客。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在他的名著《社交媒體簡史：從莎草紙到互聯網》中側重於科學研究，給我們呈現了咖啡的香氣氤氳中科學家活動的生動歷史場景。但咖啡館的“科學研究”存在規則匱乏、方法欠缺以及難以區隔“業餘”與“同行”的問題，其時就已有文章嘲諷於此，亦有皇家學會會員針砭此弊。^②相較於咖啡館，學術期刊則凸顯出其具有本質性差異的獨特屬性。斯丹迪奇寫道：“咖啡館不是17世紀中葉出現的唯一進行學術討論的新平台，還有個同樣鼓勵討論和合作的新場所，不過討論和合作是遠距離進行的，這個新場所是科學期刊。這方面的關鍵人物是皇家學會的秘書亨利·奧爾登堡。”^③對於走出咖啡館的《哲學會刊》的描繪，作者真可謂是妙筆生花：“科學刊物是對咖啡館那種海闊天空、隨意交談的氣氛的提純，把咖啡館裡的交談格式化了，使其通過出版和郵寄越過國界，創立了科學家的一個虛擬群體。”^④科學史學家D. 普賴斯（Derek de Solla Price）在其代表作《小科學，大科學》中則從“取代正統書籍而發行論文”^⑤的視角論述道：“如英國的《皇家學會哲學學報》，具有一種定期地把全歐洲的學術書籍和著作摘要整理的功能。有了這些雜誌，學者們就無需通過私人間的通訊網和私人間的傳聞便可隨時瀏覽全歐洲的書店，這些活動在以往都是必不可少的。”^⑥而“提純”、“格式化”，以及走出“以往必不可少的”、“私人間活動”而“創立科學家虛擬群體”，不正是默頓科學規範結構理論之意涵嗎？默頓在作為《科學社會學》“代中譯本前言”的長篇論文《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社會學中一個發展著的研究綱領的預示》中寫道：“哈里特·朱克曼和我於1971年合作對科學雜誌和科學論文早期的制度化進行了分析。可以認為，雜誌和論文都是一種不斷演化的社會安排，通過這種安排，不僅能實現傳播新發現和科學知識的明顯目的，而且還能因此對那種知識的智慧財產權進行註冊。”^⑦學術期刊“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科學的動力學及其機構”^⑧的功能，集中體現在奧登伯格與《哲學會刊》初步建立起的學術期刊四項基本功能：其一是註冊登記功能，即表明特定作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優先權和所有權；其二是評

估鑑定,即通過同行評議制度來保證文章品質;其三是傳播功能,向其他學界同仁傳遞作者的觀點;其四是存檔功能,即永久記錄作者的研究成果。^⑩這些系統性功能規範,誠如張耀銘所論,“確立了一種‘新的尺度’,那就是學術期刊在知識創新與傳播秩序中扮演了比書籍和書信更為積極的主導手段,成為印刷時代學術成果交流、發布、傳播的關鍵媒介,英國甚至西方近代思想和知識傳播的基本框架自此奠定”。^⑪這四項基本功能,總體看,直至今日亦未有增減損益。作為註冊登記功能,現在中外學術期刊均高度重視論文的首發權和署名權;所謂“優先權”,一直是知識社會學關注的重要議題,它既是對作者學術聲譽與文化資本的制度性確權,也是對科學研究不斷創新與突破的“動力學”激勵。作為評估鑑定功能,期刊內部審讀編校與外審專家匿名評審的同行評議兩項制度已經成為學術期刊科學規範的基本設置;同行評議固然關顧字詞句篇,更重要的是對內容的學術質量和創新性審查與研判,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擔得起“決定整個科學事業運轉的關鍵”^⑫之稱譽。作為傳播功能,學術期刊對推動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與擴散發揮著顯而易見的強大功能;關於學術期刊的傳播能力的評價,已發展出許多定性與量化的分析框架與指標體系,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學術繁榮(當然,發展過程中亦有流弊生焉,這是另一個議題,此處不論)。作為存檔功能,從反面或者更可以說明,即對存在嚴重學術不端的論文作出撤稿決定並予公開聲明已成為世界範圍內學術期刊的通行做法,從而維護著學術研究的高尚品質與榮譽體系。

作為“新的尺度”的創立,按之默頓科學規範結構理論,在中國早期學術期刊與近代學術體系建立中,亦可獲得顯明而堅實論證。早期學術期刊經歷了從譯介到學問獨立的階段,可以說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科學與學術“西學東漸”的發生發展進程。早期學術期刊“標榜輸入新學理”,顛覆了中國傳統的學術內容及其分科形式。隨著早期學術期刊的發展,論文形式逐漸取代傳統的信函、筆記、劄記、圈點、批註等形式,成為學術研究的新載體。^⑬也因為“學術期刊具有引領與‘規訓’、發現和評價、溝通和交流等多種功用”,隨著中國早期學術期刊的興起,“閉門著述、藏諸名山等傳統的學術生產和傳播方式已逐漸式微乃至消失”。^⑭一項事業,方其新創初萌之時,總是有著突出的主動性行動與自覺性意識;當其蔚然而深秀,人們反倒可能順流而下,或混乎日用僅僅習熟於“表面效度”,或日用而不知致使“供給側”不得昭彰。如果引入與我們共時而在的集刊(輯刊),學術期刊對學科的“供給側”功能可能就豁然開顯了。中國大陸期刊是審批制而非登記制,這就帶來了學科發展與刊號資源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以書代刊”的集刊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正是這一矛盾的頗具中國特色的求解之法。檢之身邊陸續興起的集刊,我們不難發現,對學科變革以及領域開拓的“大有作為”的信念,總是被標識性地表達為辦刊的宗旨與目的、任務與目標。

斯丹迪奇是這樣評價奧爾登堡的:“奧爾登堡不比牛頓、胡克和哈雷,他的名字今天鮮為人知。他本人不是科學家,但他創辦了第一份現代科學刊物,創立了國際科學合作的平台,確定了至今仍在沿用的模式;因此,他對17世紀的科學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⑮回視表1,奧爾登堡又豈是“等米下鍋”的“文字工匠”類的“傳統編輯”^⑯?奧爾登堡的創制、擘畫、交遊、奔走又豈是單純的“為他人作嫁衣裳”呢?學術期刊作為學術與學科的“供給側”,可以說是學術期刊的“初始設置”。所謂的傳統編輯向現代編輯的轉型,毋寧說是必須與必然的追本求源的解蔽與回歸。

二、機制:桌子之喻——“語用學”供給側

1. “科學知識語用學”的“桌遊”

阿倫特在討論公共領域是有一個著名的“桌子之喻”,即“桌子”抽掉,公共領域也就消失了。

從學術制度視閥，我們完全可以引用阿倫特的“桌子之喻”，即學術期刊就是現代知識生產傳播的“桌子”。圍繞著這一張張大小不同的“桌子”，學術期刊與科學研究者一道進行有某種學科發展與變革、劃界與融合的特定關係的網絡與構型的締造，這也就是利奧塔爾所說的“科學知識的語用學遊戲”。托馬斯·庫恩在其範式理論的經典之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明確提出，“論文”這一體裁乃是現代科學知識生產的基本範式：“他們通常以簡短的論文的方式出現，只寫給專業同事們讀，這些人被認為都具有共有範式的知識，惟有他們能夠寫出論文，也才能讀懂為他們寫的論文。”^⑥所謂“簡短”，是相對於長篇大論的著作而言的。而寫給專業同事並只能為專業同事所寫，在此之間學術期刊乃是不可或缺的制度設置。但是，作為一個分析框架，利奧塔爾似乎並沒有明確地將學術期刊納入科學知識語用學中。利奧塔爾論述道：“假定受話者能夠有效地同意（或拒絕）他所聽到的陳述。這意味著他自己也是一個可能的發話者，因為當他表明自己的贊同或分歧時，他和實際的發話者……一樣，也必須服從證明和反駁的雙重要求。因此他被假定潛在地具備了發話者的各種品質：他和發話者地位相等。但我們只是在他講話的情況下才能知道這點。在此之前，他不會被稱為學者。”^⑦從“作為‘科學’的陳述所具有的可接受性”^⑧的角度說，發表與傳播，必然與必須在其中。默頓則特別重視“科學知識語用學遊戲”中的學術期刊。他將論文發表中的學術期刊的評議定義為“有組織的懷疑”，洵為精闢之論。“我們只是在他講話的情況下才能知道這點。在此之前，他不曾被稱為學者。”站在學術期刊的立場，毋寧說：“我們只是在他論文發表的情況下才能知道這點。在此之前，他不曾被稱為學者。”“我們只是在他不少高品質論文發表的情況下才能知道這點。在此之前，他不曾被稱為知名學者。”不經由發表而被稱為學者，在現代科學知識生產與傳播過程中已絕無可能；而發表很少的論文，用 D. 普賴斯《小科學，大科學》討論期刊論文與學術共同體時的所用的“科學通勤者”^⑨的表述，亦即很少來學術期刊“打卡”，而能被稱為知名學者，在現代科學知識生產與傳播過程中如果有也只能被視為“奇跡”與“傳奇”，並不足以引以為普遍之論。

會聚在學術期刊這張“桌子”周圍的，有作者、編輯、同行評議者、讀者等多方。編輯自有其席位在，而不僅僅是“桌子”旁端茶遞水的服務生。作者與編輯之間展開的是一場“嫁女兒”與“挑媳婦”的“科學知識語用學遊戲”。這就對編輯核心能力提出了具有規定性意義的要求。編輯是否學者化，這是人們經常而又長久討論的議題。對出版機構來說，固然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對學術期刊來說，編輯必當學者化。學術編輯，需要用好兩支筆，一支用來“改論文”，一支用來“寫論文”。只有這樣，編輯才能作為“同行”以學術期刊人的身份參與到與作者和讀者的“語用學”遊戲中。但這也並不意味著編輯必須成為“同行”中的優秀者，再說就期刊所能涉及的廣泛的研究領域、學術議題、科學方法，編輯人員也無法做到處處時時優秀。聯通主義首倡者喬治·西蒙斯（George Siemens）提出“管道比管道中的內容物更重要”，期刊人陶侃移用來強調學術期刊編輯知識管理的素養，^⑩倒也十分貼切。所謂“管道比管道中的內容物更重要”，如張學文所論，即要求學術期刊編輯“走出學科領域專業人員所特有的‘洞穴文化’”，成為“學術思想創生的‘公共走廊’”的構建者與行走者，^⑪這乃是學術期刊作為學科建設“供給側”的力量所在。圍坐於“桌子”的，還有同行評議者與讀者。因為論文“只寫給專業同事們讀”（非專業人士當然也可能取閱，但那應該看待為學術影響力的“外溢”），讀者通常也就是“同行”。讀者的閱讀、推介、批評、借鑑、引用等，也是廣義上的或者說間接的同行評議，在統計學意義上還是更客觀、更科學的同行評議。我們這裡所說的同行評議，主要指學術期刊邀請特定專家對指定論文所做的是否值得發表的學術審查。同行評議，被譽為科學評價活動中的“黃金準則”，確認和維護著科學知識的“合法性”、研究成果的品質和學術共同

體的信譽。學術期刊同行評議的實踐,肇始於《哲學會刊》。到 20 世紀中期,學術期刊同行評議成為普遍通行的規則,也成為科學制度與文化的組成部分。儘管“在我們邁向 20 世紀最後 10 年之際,需要改進與重建同行評議的抱怨聲出現了”,^②但同行評議作為“科學建制的基礎原則”^③從未鬆動與動搖。作為學科建設的“供給側”,是指圍坐在學術期刊這張“桌子”的各種因素和資源的組合性和結構性功能。作者、編輯、同行評議者、讀者等多方作為“同行”,共同參與到“科學知識語用學”的一場場“桌遊”(Board Game)。正如有期刊人所論:“學術期刊和學者群體同為學術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學術共同體的要求和目標就是學術期刊和學者群體共同的要求和目標,學術期刊的引領本身就包含著學者群體的智慧貢獻。”^④最近,我在《教育研究》公眾號“教育研究微刊”(2024 年 12 月 6 日)看到一篇“作者割記”。作者回顧了寫作與發表的過程,寫道:“發表是‘共奏’的結果。‘夫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當其時也,一篇論文就形成了兩個並不完全是同義反復的表達之間的“共奏”:“作者寫的發表在某期刊的論文”與“期刊發表的某作者寫的論文”。故而,默頓援引齊曼(John Ziman)的這段話論證道:“發表在有聲望的雜誌上的文章並不僅僅反映其作者的觀點;它要得到作者可能已經諮詢過的編輯和評議人認定它具有科學可靠性的發表許可。”^⑤哪怕發表的論文一字未改。當然,這並不是說論文因此被褫奪為集體成果,而毋寧是被“許可”為公共知識。因為學術期刊作為“一種權威結構”^⑥通過“發表許可”的制度安排,賦予了論文“科學的國際性、非個人性”,^⑦本為學者所私存的學術成果因而得以成為“天下之公器”。

2. “拯救大兵愛因斯坦”

學術期刊是科學知識生產系統的制度設置,而同行評議乃是這一科學制度的關鍵性要素。但學術期刊的地位以及同行評議的必要性有一個不斷遞變、不斷確認的複雜的歷史進程。我們這裡通過一則愛因斯坦的例子,反向來看待學術期刊同行評議的必要性,從而進一步證成學術期刊在“科學知識語用學遊戲”中不可或缺的位置。

盧昌海《時空的樂章——引力波百年漫談(四)》^⑧全篇詳載了愛因斯坦的一篇論文發表的故事。1936 年,愛因斯坦和他的助手羅森(Nathan Rosen)展開了對引力波嚴格解的研究,而後,他們寫了一篇《引力波存在嗎?》(Do Gravitational Waves Exist?)的論文寄給《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而此前的引力波研究均為近似研究。論文寄給了美國學術刊物《物理評論》。論文提交 6 周後,《物理評論》編輯泰特(J. Tate)給愛因斯坦做了回復:“在發表您的論文之前,我希望看到您對審稿人的各種評論和批評的反應告訴他。”並附了關鍵審稿人的審閱報告副本。愛因斯坦很驚訝,自己的論文竟會被送到外部審查。愛因斯坦的回信語氣生硬,並表示再也不會把論文在該刊發表。從《物理評論》撤稿後,愛因斯坦將論文轉投他刊,“後者當然毫無懸念地接受了論文”。不過,後來的故事真可謂曲折幽微。有人向愛因斯坦告狀,跟隨他一同工作的年輕的相對論專家羅伯遜(H. Robertson)對他的研究“高度懷疑”。愛因斯坦則向告知者表示“前一天晚上他在自己的證明中也發現了錯誤”。之後,愛因斯坦致信期刊論文需作大幅修改。1937 年初,修改後的論文正式發表,標題由《引力波存在嗎?》這一“不懷好意的設問”改為“論引力波”(On Gravitational Waves)。在論文的末尾,愛因斯坦向羅伯遜表示了感謝:“我要感謝我的同事羅伯遜教授友好地說明我澄清原先的錯誤。”而後來的文獻確鑿地證明,羅伯遜就是《物理評論》邀請的拒發原先那篇論文的匿名審稿人!我們這裡更要在“科學知識語用學”的框架內審視這一事件。愛因斯坦不是學術上固執己見的人,尤其在對待他學生輩羅伯遜批評這件事上。但對羅伯遜指謬的致謝,並沒有轉化為對《物理評論》以及羅伯遜作為匿名評審專家意見的事後諒解。大佬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愛因斯坦

從此再沒有給《物理評論》投過稿。“失去愛因斯坦的投稿大概是‘審稿人制度’在推行過程中，單一刊物付出過的最大代價。”何至於此？我們推測，愛因斯坦大光其火，與其說是來自“下”對“上”的“冒犯”，而毋寧說是來自“外”對“內”的“侵犯”。“同行評議中的‘同行’，實質上是學術共同體。”^⑩然而，學術期刊的審稿是否可以作為“同行”之“評議”，至少在當時情境中的愛因斯坦那裡是不被肯定的。在愛因斯坦那裡，學術期刊似乎還僅僅是工具，我們所論的“供給側”功能大概是被他漫忽了，說到底就是愛因斯坦沒有將學術期刊視為科學規範的結構，不願意坐下來與學術期刊、同行評議一道參與這場“科學知識語用學”的“桌遊”。這場“桌遊”中的論文發表的評議，乃是“有組織的懷疑”機制的設置。默頓指出：“隨著這一過程中的評論者、雜誌的評議人和其他形式的同行評議的歷史演變模式，它與僅僅表示個人的懷疑態度已經相差太遠了。……毋寧說，它是一種受規範約束的並且是通過社會組織起來的認知警戒制度。”^⑪

科學歷史學家、《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編輯梅林達·鮑德溫(Melinda Baldwin)在 In referees we trust? 一文中寫道：“19世紀末，科學界對評議的看法開始發生重大轉變。隨著人們對科學文獻整體品質的擔憂日益增加，評議不再只是幫助保護科學社團或期刊的聲譽。取而代之的是，評議越來越被視為保護整個科學文獻的聲譽和學者可信度的一項工作，正如生理學家和國會議員邁克爾·福斯特(Michael Foster)所說的那樣，阻止‘真正的污水被扔進純粹的科學之流’。”^⑫愛因斯坦曾在《物理評論》發表過兩篇重要研究，但均未經過同行評議環節。這兩篇研究仍有不完滿的地方。經由此事，人們不禁要問：“如果經由匿名評審是否能夠降低這兩篇論文出錯的概率？”而這次，設若沒有事實上的期刊評議人的羅伯遜的阻攔，原先的論文大概率會繞過“通過社會組織起來的認知警戒制度”的“規範約束”，從而得以順利發表，那麼愛因斯坦“‘引力波先驅’的身份不免會有所失色”。這也是盧昌海給“漫談(四)”擬定標題“拯救大兵愛因斯坦”的用意與妙趣所在。

當然，這場“科學知識語用學”“桌遊”從來都不可能都是“一團和氣”的。愛因斯坦的“脾氣”依然隱顯在作者與學術期刊的交往中，幾乎可以說沒有哪家期刊沒有遭遇過。但是，“在沒有直接的金錢獎勵的情況下”，論文因“公開發表”而“廣為人知時”，作者對成果佔有和享有的“情結”得到了“制度化”表達和保障。默頓在討論這一議題時闡述道：“隨著這種情結在科學之中逐漸制度化，它促進了公共知識的增長，也使得直到17世紀依然清晰可辨的個人對神秘知識和私人知識的偏好黯然失色。這種制度化的開放交流及相應的獎勵系統，已經在現代科學中規範地發揮作用了，正是這一點在科學的規範結構中被描述為‘公有性’(或者，諸如後來人們喜歡說的‘公有主義’)的要素。”^⑬默頓所論，不啻是歷史事實，也是情理兼備之言。

三、體制：超建制——“組織學”供給側

1. 從學報“本校園地”的定位說起

1998年4月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印發《高等學校學報管理辦法》的通知(教備廳[1998]3號)。文件的第一條是：“為了……制定本辦法。”這算是文件的開頭語，亦即所謂“帽段”。第二條是：“高等學校學報是高等學校主辦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學成果為主的學術理論刊物，是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的重要園地。”則可謂開宗明義，對學報做了“本校園地”的定位與定性。同年2月新聞出版署印發《關於建立高校學報類期刊刊號系列的通知》(新出報期1998,109號)。通知將“學報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學術、科研論文或資訊”列為內部學報轉為正式學報的條件。長期以來，高校學報的學術質量廣受詬病。2007年10月首屆高校學術期刊發展論壇暨《中國政法大學學報》首

發式上,著名經濟史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李伯重直陳“大多數中國大學的學報都是學術垃圾的生產地”,並在隨後的發言中得到多位教授的認同。^③以至2013年4月11日《中國青年報》在“中青評論”欄目發表評論員文章:《製造垃圾的高校學報不如停刊》。^④學報遭此叱斥,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本校園地”的定位則是咎無可辭。2007年《南京大學學報》主編朱劍發文指出:“長期以來,社科期刊特別是高校學報是被這樣定位的:它是主辦單位(高校或院所)科研的窗口,是本單位科研人員發表學術成果的園地;在民間還有另一種更形象的說法,叫作本單位教授副教授的搖籃。我們姑且把這樣的定位簡稱為‘窗口說’。這種說法最基本的內涵就是社科期刊應該是專門為本單位科研人員發表論文服務的。……因此,自我封閉的問題在高校學報中尤為嚴重。表面上看,內稿必須佔有壓倒性比例只是對作者身份的限定,但實際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觀念和體制上的問題更是阻礙了社科期刊應有作用的發揮。”故而,作者呼籲學報要回歸到“學術共同體”。^⑤

學術期刊的組織邊界是由“實線”與“虛線”共同刻畫的,具有“超建制”特徵。所謂“實線”,是指學術期刊作為編輯部、期刊社(雜誌社/期刊中心等),可歸入管理學大師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組織構型理論中的專業式官僚結構,是從屬於上一級機構的“單位”或“部門”。所謂“虛線”則是從實體性的辦公室走向虛擬性的“桌子”,從照章按例到“語用學”的“桌遊”。當然,如果主要還是本單位科研人員發表的園地、本校教師成長的搖籃,那麼就只有“實線”了。“超建制”,並非指建制之外,而毋寧是建制之上。我們以此禮讚,緣乎學術期刊乃是現代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樞紐”。庫恩正是在“關於科學團體的更嚴格定義”時作出論文是現代科學知識生產的基本範式的斷言的。這一基本範式必得有延長線連結至學術期刊,因為如果缺省了學術期刊,論文就難以進入到科學團隊參與“科學知識語用學的遊戲”,當然也就不能成其為真正的論文,亦即“在此之前,他不會被稱為學者”。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教育學院名譽教授邁克爾·彼得斯(Michael A. Peters)以庫恩範式理論的視閥討論道:“發展中的世界知識體系是由學習型社會和大學觀念與實踐變革決定的——‘科學’、‘研究’、‘技術’——包括對其認識論基礎的反思(如真理、有效性和正當性);不斷發展的學術出版建制,包括作為科學傳播制度的現代期刊概念的演變。我們可以假設在知識制度、認識觀、對驗證知識的關注、以學術期刊為核心的學術出版之間,存在多維的關係網絡。”^⑥這一關係網絡,就學術論文之於學術期刊而說,可以簡單粗暴地用“不出版即出局”(“publish or perish”)來表達。而所謂的“出局”,亦即出“科學團隊”之局。另一方面,這一延長線還顯豁地表現在傳播效應上。正如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說:“知識就是力量,但是這種力量不僅取決於其本身價值的大小,還取決於它是否被傳播以及傳播的廣度和深度……”^⑦期刊發表比之口耳相傳又豈止倍增?論文因正式刊發得以成為學術交流網絡的一個節點,越具有創新性的優秀學術成果就越能在網絡傳播的幂律分布中產生指數級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期刊論文的傳播和讀者對論文的取閱,主要不是知識消費行為。一方面,這是非正式的同行評議的學術場。另一方面取閱本身總體上是作為專業同事的“讀者↔作者”關係的不斷往復循環,本質上屬於生產行為,與消費旨趣的大眾文化不同(本文只是在科學研究視閥討論,並不排斥學術與大眾文化發生關聯,但那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話題)。學術交流網絡節點的連結所勾勒的,是虛線的、不斷變易的學術空間,營造了學術期刊獨特的組織形態。其如普賴斯在《小科學,大科學》第三章“無形的學院與源源而來的科學通勤者”所說的,期刊與讀者不可能是“一直是個封閉的圈子”。^⑧普賴斯對科學及其共同體發展的研究很大程度正是建立在對期刊論文的文獻統計學基礎之上。戴安娜·克蘭(Diana Crane)的代表作《無形學院》一書的副標題即是:“知識在科學共同體中的擴散”。所謂“無

形學院”是指科學研究領域具有共同目的和興趣的科學家自發形成的，進行情報傳播交流的非正式團體。作者在她的簡短的中文版序言中特別強調了科學文獻“互引分析 (co-citation analysis) 和引證的因子分析”的“研究科學專業的新途徑”。^④克蘭對文獻計量學的成功運用，也對接續而來的學術期刊評價的量化模型和指標體系的開發發揮了導引作用。

2. “亨利·奧爾登堡已經添加你為朋友”

“亨利·奧爾登堡已經添加你為朋友”，是斯丹迪奇在《社交媒體簡史：從莎草紙到互聯網》介紹奧爾登堡與《哲學會刊》一節的標題。書中寫道：“奧爾登堡向國外宣傳《哲學學報》，提高了皇家學會的國際聲望和權威，使外國的科學家願意提交論文在《哲學學報》上發表，到倫敦旅行的知識人士也以一訪皇家學會為快。1668年3月，奧爾登堡寫信給玻意耳說：‘學會在國外享有極高的聲望，訪客紛至沓來；自從今年3月以來，我已經接待了二三十位外國來訪者。’”^⑤這裡的“玻意耳”又通常被譯為“波義耳”，就是有著“化學之父”之譽的羅伯特·波義耳 (Robert Boyle)。波義耳是皇家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將皇家學會這一類科學活動稱之為“無形學院” (invisible college)。皇家學會的創始成員都是法蘭西斯·培根科學精神的追隨者，“無形學院”正源於他的小說《新大西島》 (New Atlantis) 對科學共同體的構念。默頓在《科學社會學散憶》中給“無形學院”下了一個定義：“從社會學意義上，可以把‘無形學院’，解釋為地理上分散的科學家集簇 (clusters)，這些科學家處在較大的科學共同體之中，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在認識上的相互作用要比和其他的科學家的相互影響更為頻繁。”^⑥前面提到與咖啡館的科學家活動不同，《哲學會刊》“討論和合作是遠距離進行的”，再按之此處的“到倫敦旅行的知識人士也以一訪皇家學會為快”，不正是默頓所說的“地理上分散的科學家集簇”嗎？“亨利·奧爾登堡已經添加你為朋友”，不正是學術期刊構建學術共同體的“超建制”的組織方式嗎？

“亨利·奧爾登堡已經添加你為朋友”，是“知識制度、認識觀、對驗證知識的關注、以學術期刊為核心的學術出版之間”的“多維的關係網絡”的締結。每一篇刊發的論文及其作者，都是學術世界的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巴拉巴西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在其巨著《連結》一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⑦20世紀60年代後期，肯尼斯·威爾遜 (Kenneth Wilson) 還只是康奈爾大學物理系一位助理教授。每個人都知道他很聰明，但是他的聰明才智沒有能變成期刊論文。這影響到他在康奈爾大學的教職。迫於終身教職委員會的壓力，“他從抽屜裡抽出幾份稿件發表了”。其中兩份稿件在1971年11月發表在《物理學評論 B》 (Physical Review B) 上。這兩篇論文改變了統計物理學，為相變提供了一個優美而統一的理論。威爾遜也因相變理論的傑出貢獻贏得了198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巴拉巴西在為威爾遜行為解釋說：“這是學術界量化成功的有形指標。”這也許很容易引發人們對“以刊評文”以及學術量化指標的評價制度的詬病。但我們這裡看到的更是從“抽屜”裡抽出到發表在《物理學評論 B》這一“改變了統計物理學”、推動學科發展的巨大成就以及贏得物理學諾獎的巨大榮譽。巴拉巴西也正是此意。《連結》的中心思想就是宣揚和論證網絡節點的連結效應，尤其是像威爾遜及其理論這樣的樞紐節點的巨大效應。巴拉巴西給這一節擬的標題是：從“隨機”灌木叢到“自組織”舞台。這一標題，正可以引用過來描述學術期刊對學術場域的“超建制”營構。如果只是在“抽屜”裡，在學者的頭腦中，在各種各類私下交流和小空間交流的隻言片語、PPT和簡短報告中，那麼新的科學知識就還總體性地處在“隨機”灌木叢的狀態。正是或主要是學術期刊以“科學知識語用學”機制建構了“自組織”舞台。這個舞台上，學術成果得以發布和交流，“有影響力的‘期刊承認’很容易轉化為‘學術共同體承認’”。^⑧學科網絡得以進一步締結、變易

和擴散,學者得以頻頻亮相而建立起自己的學術聲望和文化資本,從而給知識生產、學科發展和學術研究提供“源源而來”的“動力學”勢能。正是學術期刊的發表,才有了論文反復傳播的軌跡;正是有了論文反復的傳播軌跡,才得以刻畫出知識的學科邊界和學術共同體的組織邊界。

“從‘隨機’灌木叢到‘自組織’舞台”,“自組織”可以視為“實線”之外的“虛線”所刻畫的形態,其背後的邏輯是學術自治。威爾遜及其理論能夠成為學術網絡中的樞紐節點,同樣也是“自組織”形成的。“亨利·奧爾登堡已經添加你為朋友”,這裡的“你”包括讀者,這也是學術期刊作為“超建制”組織的邊界。按照巴拉巴西的理論,一個節點的成長速度完全由該節點的度決定,讀者作為專業同行,通過下載、推介、引用、驗證等對樞紐節點發生高頻度、高強度的“偏好連接”,從而大大擴展了作為樞紐節點的論文及其作者的影響力。同樣,那些幾乎無人問津的節點,也是讀者作為專業同行所做的具有自然法則意味的學術自治的選擇。在“亨利·奧爾登堡已經添加你為朋友”一節的最後,斯丹迪奇饒有興致地寫道:“不過近年來,咖啡館那種生氣勃勃、隨意率性的精神又重新出現,悸動於互聯網論壇的討論中和社交媒體的平台上。這些場所像它們之前的咖啡館一樣,為辯論和探討提供了自由開放的空間……還有一點也和咖啡館一樣:互聯網論壇最初是為學術界服務的。在瑞士工作的英國物理學家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1991年創建萬維網的時候,目的是要改善從事科學研究的同行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像咖啡館一樣,原來由科學家佔據的社交空間證明它的吸引力廣泛得多,由於社交媒體使得不同思想得以多次交匯混合……”^⑤這真是一個非常有趣而又十分重要的議題。確乎如此,隨著互聯網和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不斷發展,開放存取(Open Access, OA)、開放協力廠商平台、開放同行評議(open peer review, OPR)、預印本(Preprint)等日益興盛,學術期刊對學科建設“供給側”的功能得到進一步增強,其模式正處在不斷優化、調整和變革中,“超建制”的組織邊界也在不斷變易與擴展中。但是,學術期刊的“非彈性市場”屬性還在,由於科學本身的邊界性,“專業同行”以及“學術共同體”具有“自限性”特徵,本文討論的議題和提出的命題仍然會在新的場景獲得新的解釋。

①⑦⑧⑩R. K. 默頓:《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社會學中一個發展著的研究綱領的預示(代中譯本前言)》, R. K. 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與經驗研究》,魯旭東、林聚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9頁;第37~38頁;第16頁;第9頁。

②⑥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9頁;第19頁。

③《知網如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市場監管總局通報了》,北京:《新京報》,2022年12月26日。

④崔建民:《“作嫁衣者”說——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編輯心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⑤劉忠博、郭雨麗、劉慧:《“掠奪性期刊”在學術共同體中的形成與省思》,北京:《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10期。

⑥Bernald Donovan:《學術期刊的未來》,陳樂佳譯,北京:《科技與出版》,2000年第2期。

⑦陳恆:《期刊是知識平台也是傳播觀念的場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12月20日。

⑧張姿、于靜宇:《傳統編輯職責的再認同》,北京:《出版發行研究》,2009年第8期。

⑨⑤謝競遠:《試論傳統編輯向策劃編輯轉型的意義及特質》,哈爾濱:《學理論》,2009年第18期。

⑩康軍:《高校學術期刊編輯主體性價值的提升策略》,南寧:《傳播與版權》,2024年第2期。

⑪楊九詮:《論學術期刊的學科建構功能》,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2期。

⑫王浩宇:《近代早期英國咖啡館文化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68~69頁。

⑬⑭⑮⑯⑰湯姆·斯丹迪奇:《社交媒體簡史:從莎草

紙到互聯網》，林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41~142頁；第148頁；第147~148頁；第146頁；第147~148頁。

⑮⑯⑰⑱ D. 普賴斯：《小科學，大科學》，宋劍耕、戴振飛譯，上海：世界科學社，1982年，第54頁；第54頁；第53頁；第64頁。

⑲ 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uture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Commission Research Report, 2019, p.24.

⑳㉑ 張耀銘：《歐美同行評議的歷史演進與發展趨勢》，昆明：《昆明學院學報》，2023年第1期。

㉒⑳㉓ R. K. 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與經驗研究（下冊）》，魯旭東、林聚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666頁；第668頁；第668頁。

㉔ 石峰：《中國期刊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4~180頁。

㉕㉖ 陳義報：《〈燕京學報〉對學術共同體的構建及對當下學術期刊的啟示》，北京：《出版發行研究》，2016年第2期。

㉗㉘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後現代狀態》，車槿山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0頁；第89頁。

㉙ 陶侃：《學術期刊編輯的學習力：意蘊、活化與拓展——基於知識的社會建構視角》，武漢：《出版科學》，2012年第5期。

㉚ 張學文：《促進專業研究與學科成長：學術期刊及其編輯的功能——以教育學科為例》，北京：《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3年第12期。

㉛㉜ 達里爾·E. 楚賓、愛德華·J. 哈克特：《難有同行的科學：同行評議與美國科學政策》，譚文華、曾國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頁；第1頁。

㉝ 馬旭：《學術期刊引領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機理和要求——基於學術共同體的視角》，北京：《科技與出

版》，2024年第6期。

㉞ R. K. 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與經驗研究（上冊）》，魯旭東、林聚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67頁。

㉟ 盧昌海：《時空的樂章——引力波百年漫談（四）》，北京：《現代物理知識》，2017年第4期。

㊱ M. Baldwin, In referees we trust? *Physics Today*, 2017, 20:44~49.

㊲㊳ 羅伯特·K. 默頓：《科學社會學散憶》，魯旭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67頁；第8~10頁。

㊴《清華教授：大多數中國大學學報是學術垃圾生產地》，西安：《華商報》，2007年10月22日。

㊵ 馮雪梅：《製造垃圾的高校學報不如停刊》，北京：《中國青年報》，2013年4月11日。

㊶ 朱劍：《徘徊於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4期。

㊷ 邁克爾·彼得斯：《世界期刊知識體系的興起：社會主義平台期刊的前景》，楊柳譯，北京：《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

㊸ 楊玉良：《關於科學普及與中國未來發展的思考》，北京：中國科學院院刊，2023年第5期。

㊹ 戴安娜·克蘭：《中文版序言》，戴安娜·克蘭：《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中的擴散》，劉珺珺、顧昕、王德祿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2頁。

㊺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連結：商業、科學與生活的新思維》，沈華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8~109頁。

作者簡介：楊九詮，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主編，編審。上海 200062

[責任編輯 劉澤生]